

邱运华等

著

19-20 SHIJI ZHI JIAO

EGUO MAKESIZHUYI WENXUE SIXIANG SHILUN

19—20 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20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

19-20 SHIJI ZHI JIAO EGUO MAKESIZHUYI WENXUE SIXIANG SHILUN

邱运华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0 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邱运华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

(京华学术文库)

ISBN 7-301-10590-8

I. 1… II. 邱… III. 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①A811.691②I51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809 号

书 名: 19—20 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

著作责任者: 邱运华 等著

责任编辑: 金春梅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590-8/I·07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1 印张 335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本书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属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11 建设规划项目

本书出版受首师大文学院 211 建设规划项目经费资助



自序

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却又陌生的话题。说对它十分“熟悉”,是因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还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上是经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的理论和思想,而这套话语体系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改革开放以来使用率很高的一个术语——“对话”,都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印记。然而它又是陌生的,因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并没有写出一部独立而系统的专著来研究 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而是仅仅满足于翻译和介绍苏联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也许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把我申报的这个项目列入资助的原因。

我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 19—20 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话语建构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是具有自身理论逻辑和现实关怀的话语系统,它是在与不同时期的俄国现实的交往中存在着的,而在它的内部,又拥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彼此竞争和对话。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问题的凸现背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话语建构有密切联系。每套话语体系都是在自己的现实联系中建构起来的;它时刻与现实进行对话,并且在与现实的对话和交往中生存。这样,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因其关注的具体现实对象主要局限在西欧,而与俄国 19—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文学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与现实的对话和交往中成为两套话语系统。这样,在我看来,就存在着两套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话语系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西方话语系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俄国话语系统。

前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思想阐述之后,梅林、拉法格和考茨基等人做了大量的发挥和引申工作,形成了一套话语系统。它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后者,我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俄国话语系统,显然包含着这样一个认识:他们结合着自身民族的现实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艺学的新命题,或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命题作了重新排序,从而,建构了一个新的语境。但是,这两套话语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这个联系首先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关注,对于俄国解放运动和文学思想的成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其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俄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解答和反思,直接启发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也影响了他们对具体的文学问题的创造性思考。可以说,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俄国的现实关怀和文化关怀而形成的独特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套话语的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立场和视野的学派。这些学派在建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系统的过程中彼此竞争、交流、对话,以一种动态的结构而存在着。我选择并研究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巴赫金的文学思想,认为,在回应现实提出的具体文学问题时,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家内部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我不以为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倾向于理解为学派和学理的不同使然。例如,在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面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诞辰和去世所凸现出来的理论问题时,他们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对这个文学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思维方法和结论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甚至演化为两种不同的批评传统。又例如,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文学批评的价值评价问题所进行的论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战、巴赫金与斯大林时代文学社会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布哈林与葛兰西之间的理论联系等。我认为,学派的存在,其原因不仅仅在政治立场上,也不应该仅仅从哲学理论水平的高低上来寻找原因。当然,以上的理解是必需的,然而是不够的。不同学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具体的理论家的学识、气质、教养、趣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或

者问题的不同方面、价值取向等。实际上,正因为19—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话语系统中存在着不同学派之间的彼此竞争和对话,才使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显示出勃勃生机,成为一套多声部的话语。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内部的这种不同学派之间竞争的消失,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才出现了一种危机。

我试图把上述两个立场带进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把历史话语的进程与理论建设中具体问题的思辨结合起来,做到史论相得,以史的叙述带动和引导论的展开。我以为,这样的把握便于使个案研究具有历史的视野。例如,在对列宁的文学思想的研究中,我引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以及普列汉诺夫在文学社会学方面所作的理论建设,在这个背景下,结合未来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面貌,讨论列宁对文学反映者的功能的强调所具有的理论价值。而在论述青年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研究时,则把20世纪20年代俄国国内的庸俗社会学诗研究与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思考作为研究的背景,这样,话语的历史性叙述与理论研究的深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是把本书称为《19—20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的原因。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是19世纪后30年到20世纪的前30年。对于这个时间的跨度的选择,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时间跨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话语形成和固定的全部过程。对于这个时段的上限(即19世纪70年代)的思想史意义的理解,在学术界的理解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而对于下限(即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史意义的理解,我是这样认识的:在意识形态发展史方面,这个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思想界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的标志时间,在文学思想发展历史上是形式主义文学思想以及其他或非或反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流派淡出的时间。而以后的斯大林时代的醒目标志使这个时间变得更具标志性。

私下里,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在体系的建构和个别观点的出新方面,能够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建立一个更新和更高的平台。一是希望在新的语境下提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体系。在此之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研究,基本上是以政

治立场的臧否为判断标准,在这个判断标准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体系,就表现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特点,而对政治立场不同、思想方式相异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家则持排斥和漠视的态度。本书试图以文学思想的学术价值评判为唯一标准,以现实优先和文化关怀为主线,而放弃了以政治立场的评判为唯一标准。因此,本书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体系包括了政治立场相近、相异或相反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基本命题下把他们整合为一个体系,因此,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包容性。二是希望提出话语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案例。在中国学术界和俄国学术界,对于本研究课题的基本态度是:把研究对象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状况联系在一起研究,而现实状况的变化主宰了文学思想的价值判断。这样,文学思想的研究缺乏必要的自恰和相对独立性。我的基本思路是超越以上的研究路数,采取话语研究的方法,以文学思想自身的话语逻辑为基本研究视角,在整体的话语语境中确立个别主题的学术价值。这个研究视角的确立,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历史是崭新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三是希望以客观梳理研究对象的思想、发掘其思想根源替代政治立场的区分为主要价值判断标准,在具体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意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形成了固定的命题、视角和研究方法,例如以基本命题(真实性、党性、阶级性、典型性、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为线索,以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普列汉诺夫与民粹派、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与托洛茨基、布哈林与斯大林等)为线索,在主题和斗争的视角下,对参与该视角的文学思想家进行裁剪。本成果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以对象自身的思想逻辑为主体,在思想逻辑梳理和观点的对话中确定它的价值和意义。这个研究视角使研究成果更具客观性,也不易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具有长期稳定性。

我自感学识浅陋,因而这个工作完成后迟迟不敢示人,然而,工作是需要人来评说的,况且申请项目之时就已经有过承诺。所以不揣浅陋,以之付印,还有求得指点之意——或有有心者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呢,也未可知。

基于上,乃自序。

作 者

2004 年 10 月 24 日

目 录

自 序	(1)
绪 论	(1)
一 研究的学术背景	(1)
二 基本术语的界定	(4)
三 在话语研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15)
四 另类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思想话语成分	(19)
 第一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23)
一 现实优先的原则: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现实语境	(24)
二 文化解读: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民族文化语境	(40)
三 学派与学派间对话性的存在	(44)
四 实践性品格:面对文学现实新问题的回答	(48)
 第二章 普列汉诺夫:诗学的“获生的跳跃”	(54)
一 民粹派文学批评:启蒙话语中诗学的意识形态性	(58)
二 别林斯基:诗学的现实关怀	(71)
三 诗学的政论批评与意识形态之维度的建立	(87)
四 不自觉的“艺术文化学”研究	(99)
 第三章 列宁:建构文学反映论的意识形态视野	(112)
一 列宁的文学反映论思想的理论起点	(115)
二 作为列宁文学反映论之哲学基础的认识论特征	(124)
三 文学反映论的提出:一个指向现实使命的命题	(131)
四 党性原则——列宁文学反映论的最高体现	(148)

五	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阵营内部的不同学派的对话	(157)
第四章	托洛茨基:诗学,在革命的名义下	(175)
一	托洛茨基的文学活动和他的文学思想系统中的 基本问题	(175)
二	“革命的诗学话语”	(180)
三	诗学的社会学批评和阶级分析	(191)
四	“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	(200)
第五章	卢那察尔斯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 自我意识	(217)
一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我意识和体系化	(217)
二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美学维度	(225)
三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文体特征	(242)
第六章	布哈林:建构体系的欲望	(256)
一	文化中介与形式的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视界下的文艺问题	(258)
二	“无产阶级文化”作为一个问题	(269)
三	布哈林与葛兰西:现实影响与批评	(279)
第七章	巴赫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理论整合	(285)
一	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学说与文艺学研究的视野拓展	(286)
二	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	(294)
三	巴赫金的“形式学说”及其意义	(306)
	结束语	(320)
	主要参考书目	(322)
	后 记	(326)

绪 论

本章解决的问题是一般性的,也就是从对于本题目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入手,回答对于研究它们必须面对的基本对象、思路、方法论等问题。这是一般的人文科学不能回避的。

一 研究的学术背景

“19—20 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一课题,旨在研究 19—20 世纪之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以整体观照带动个案研究,研究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产生、发展、流变的具体过程,梳理它与其他文学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进而总结它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如何与俄国文学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规律。笔者认为,在 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黄金时代背景上,呈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学院派文学思想、民粹派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现代派批评以及各种宗教文化批评等多家派别众声喧哗、彼此争鸣的多元话语局面。而在这一争鸣局面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无疑是代表未来的主流。

关于这一课题,从鲁迅、瞿秋白、胡秋原到我国当代学者主要作了以下一些工作:一、分别主要从日文和俄文译介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经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例如,列宁《论文学》、《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沃罗夫斯基《论文学》、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和布哈林的论著等,皆翻译成中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二、对其中大部分理论家的思想作了个案研究,尤其是对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研究比较深入,相继出版了《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陈寿朋)、高放和高敬增的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研究

著作、《探索集》(吴元迈)、《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程正民)、《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马奇)、《美学、艺术、社会: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王秀芳)等专著,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如吴元迈、程代熙、李辉凡、张羽、张捷等的专题研究论文。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金雁和卞悟《农村村社、改革与革命》等,对于这个研究课题的视野的开拓,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三、在一些描述性质的著作里,专辟了一些章节述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一些经典作家的理论建设。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在描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批评”时,单列一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介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列宁、奥利明斯基、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邵武勉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如司徒卢威、柯罗普卡、波格丹诺夫等等也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立。在这些书里,列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创建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的专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命题,例如“艺术起源”、“阶级社会的艺术”、“艺术的本质和社会作用”进行了廓清,对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一些现象如“托尔斯泰创作的矛盾”、“托尔斯泰与俄国社会的关系”等,给予了辩证的分析。程正民先生《20世纪俄苏文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列宁阶段”为名,概述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文艺学观点,但是,对于其他人的文艺学观点则未曾详细论及。王善忠先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也辟有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等经典作家的专章。四、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里一些影响深远的论题如“列宁论托尔斯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研究得比较深入。

对于“19—20 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一课题,俄国学者的研究相对深入全面些,这主要表现在:一、个案研究深入。他们集中深入研究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取得了相当深厚的成果。二、资料考据翔实。在资料考据方面,他们研究了几乎全部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经典作家著作的写作背景、主题来源和对话前提,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三、对于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和个案,俄国学者研究到了相当深的程度。M. 卡冈《马克思主义美学史》(1980)、彼·尼古拉耶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

学》(1983)、M. 奥夫相尼科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美学理论》和Г. 弗里德连杰尔《马克思与古典美学遗产》等著作可以作为代表。这些著作的某些结论,如“在文艺理论中,波捷勃尼亚关于语言以及整个的关于文学作品的‘内在形式’的学说占有重大的地位。它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第一个阶段的特点影响了某些试图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经院文艺学派的命运。”“经院学派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联系问题具有严肃的历史意义。”Г. 弗里德连杰尔、A. 伊祖耶托夫、梅拉赫等俄国学者关于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的侧重点差异、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观、与俄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联系、继承和发展的有关成果,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启发价值。

但是,严格地说,从俄国文学思想的整体发展和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这两个角度,来观察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观察它在世纪之交这一特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观察它内部的观念发展、变化以及它的不同流派,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尚未有学者系统论及。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首先,廓清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内部的经典作家在理论观点上所属的不同学派。这种学派差异,往往被我们在理论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所忽略,从而造成这样的假象,似乎在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间不存在理论方面的特点。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和特点,既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思维方式和批评的侧重点,同时又有个人修养的原因。从理论上清理出他们的各自特点,便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视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机械划一的僵死的教条。其次,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革命民主主义、民粹派文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继承发展关系。它是对自己民族的进步文学思想的继承、发扬,同时又是在一个全新的时空背景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因而,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但是,这种继承和发扬关系,是有侧重点的,例如,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对“内容”批评过于偏重,而在“形式”批评方面却未予充分注意。关于这一点,经典作家们也是有差异的,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和巴赫金就相对注意得多。第三,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同时期出现的象征主义、未来派、形式主义以

及种种宗教文化派的文学批评具有千丝万缕的思想对话关系,实际上,正是在对话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生命力被充分激活了,并介入到文学创作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注意这种思想对话关系,对于我们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中重要论点和特色的形成语境,具有重要价值。第四,有助于当前俄国文学研究界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世纪之交俄国文学思想整体观念。世纪之交俄国文学是否如有些人所说是“白银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现实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在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思想背景上处于一个什么地位?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五,在一个新的世纪之交,总结上个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包括不同流派的形成),对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发扬光大,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对于纯粹的学术史来说,总结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整体发展历史,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二 基本术语的界定

(一) 研究对象

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即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我试图在两个基本体系中来界定它:一是在俄国文学思想的体系里来界定;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体系里来界定。

对于文学思想研究来说,一个基本的现实是:研究的对象时刻在两个维度下唤起研究者的注意——你既不能忘记显示该命题价值的基本的文学创作现实,也不能忘记赋予它的术语和命题以基本意义的理论语境现实。这两个维度给予研究对象以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一般的科学相分离。它必须面对来自文学现实和理论现实的质问,必须以这个质问为基本的听众来思考,而不仅仅面向单纯的真理。同时,人文科学的主体性的存在,主体的立场的存在,使它的结论必然迥异于单纯的真理性。皮亚杰说:“以人为主体的各种人文科学,它们的认识论中心难题延伸成为这样一个难题,即这一客体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语言和各种象征手段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客观性及其非中心化的先

决条件就更加困难并且常常受到限制。”^{〔1〕}对于我们自身也参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尽管方式各自不同)的研究,我们也就以自己的方式来把握它。

1. “俄国文学思想”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个问题乍一看是十分明确的,不需要再作界限的廓清。但是,稍微专业一点地思考,又会发现,虽然在很多场合这个术语使用率极高,然而这个问题基本上未能够加以明确,人们在得到这个术语的时候,会同时唤起几个不同的联想,会给予它几种彼此交叉、矛盾的内涵。这就意味着,对于它的理解产生了歧义。因此,对于其他命题有必要的术语廓清工作,在这里仍然不能或缺。

一个命题的提出,必然要面对特定的对象和特定的语境。“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个命题的对象,首先是“俄国文学思想”。界定清楚“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个术语的内涵,首先必须在“俄国文学思想”这一体系下进行。

“俄国文学思想”这个大范畴指的是什么?概括地说,在本书面对的19世纪文学现实语境里,这个术语唤起人们联想到的是普希金、别林斯基、谢维廖夫、纳杰日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烈夫、维谢罗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列夫·托尔斯泰、尼·米哈依洛夫斯基等人搭建起来的理论构架,它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丘特切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梅烈日科夫斯基、蒲宁和库普林等作家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在俄国文学创作的背景下生成的观念体系、术语、批评方法和艺术理念等的集合体。在这个术语下,有哲性诗学、民主主义文学理论、宗教文化批评、历史文化诗学、民粹派的文学批评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是俄国文学思想这个大范畴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说是“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一句习惯的空洞的套话,而是指: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是面向俄国社会现实、历史现实、民族心理现实、思想现实和文学创作现实进行思考、理论归纳、总结的表现。它既不是舶来品,也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产物。理论从来不是偶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以上各种现实的关系,是密切犹如血肉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透过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可以关注到以上现实的基本问题、基本倾向和基本情感。那么,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性质的关系呢?

从时间上看,一般来说,一个独立概念的“俄国文学思想”出现在 19 世纪上半期,它与这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学自觉联系在一起。别林斯基曾经指出,在 19 世纪之前的俄国不存在文学,^[2]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话语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个概念及其相关内涵则大致出现在 19 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即 1870—1880 年左右。这意味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要继承业已形成的俄国文学思想的理论遗产。这个理论遗产既包括与它自身的思想倾向、价值取向相一致的因素,也不能回避与之基本倾向和价值取向相悖的因素。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都必须与之对话。

从“俄国文学思想”内在的因素来看,存在着许多彼此联系、交锋、对应的理论流派,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它们的关系是共存、对话和一定程度上交融的。^[3]无论是在此之前的理论流派,还是在此之后的理论流派,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都无法回避它们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首先是对自身理论地位的确认,因为,理论的存在合法性,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的需要,是面向现实并且回答现实提出的紧迫问题,另一方面则来自理论之间的交锋:理论要证明自身的真理性的需要。虽然它也同样是来自现实的,但是,它更多地源于理论的现实,而不是社会的现实。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也必然在与其他理论交锋,为自身的合法性而辩护。在这个辩护的过程中,它与其他理论一起,更加清晰地完成自我认识,完成与其他理论的区分,完成自身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历史存在的合法性。例如,普列汉诺夫与尼·米哈依洛夫斯基之间的对话、列宁就托尔斯泰现象与各种解释学派之间的对话。

在与俄国文学思想的关系中,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俄国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属于替代的线形关系。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从来没有实现对俄国文学思想其他流派的现实性替代。由于处于大范畴和小范畴的位置,因而在整体上的替代是不可想象的,在个别上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它与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的关系属于共存和交叉性质。

2. “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与一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作为两个概念,很容易得出简单明了的结论,类似于“俄国文学思想”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的关系。然而,假如那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迷失理论的身份,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理论的民族身份问题,另一个方面是理论自身的话语历史问题。

一种理论的民族身份决定了它的基本内涵。我们接受一个基本常识:理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以概念、思想、方法、价值观念体现出来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这就意味着,一种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它所在的民族的生活。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首先是扎根在俄国现实土壤里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俄国社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注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体系,它必须面对俄国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评价,这就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是俄国的。而作为俄国民族的理论体系,它就必然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意志、感情、思维方式、价值评价标准甚至宗教情感去思考,去面对丰富的文学创作现实。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业已存在的理论话语体系的延续和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下的建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融合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在自身的理论特征完形之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尤其是德国的理论家如考茨基、卢森堡、梅林等)的智慧和遗产。就其作为一套理论话语来说,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始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特征鲜明、具有相当的思想独创和理论开拓的组成部分。

必须强调,以上两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理论的民族身份与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沿革,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两个部分,不是可以作为定量分析的“第一”、“第二”这样的阶梯、环节等,不是方法和历史内涵的关系,更不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纯然无间的整体。“它是一个‘这个’,而且必然如此。”(恩格斯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决定了我们研究的基本立场。